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委婉语研究

杨芳, 靳蓉, 马玉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交际活动中人们使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具有多样性,或直接或间接、或浅显或隐晦。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交流思想需要交际主体做出选择。在社会日常交际活动中,为了礼貌,人们倾向于掩饰一些微妙的或冒犯性的概念而使用委婉语。以面子理论为基础,从文化角度对委婉语表达的研究表明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要求译者使用恰当的委婉语。

关键词:委婉语;面子理论;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1-0071-05

Euphemism in Ligh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YANG Fang, JIN Rong, MA Yu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expressions vary in the plain or vague employ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human interaction. The choice of diction or certain expressions is based on the decision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euphemism is apt to conceal subtle offensiveness. The paper studies the euphemism in ligh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face theory.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require the appropriate use of euphemism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euphemism; face theory; cultural translation

一、引言

在社会日常交际活动中,为实现成功的交流,人们十分关注交际中的礼貌以掩饰可能冒犯对方的言语和行为。委婉语是人们关注礼貌而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交际活动参与者为了掩盖或弱化一些容易引起人们消极情绪的表达式而使用的语言。总的来说,委婉语是特定文化的符号,是特定文化的反映,每种文化都有其相应的委婉语编码解码表达方式。不同的文化产生于不同的社会,不同文化中人们接受限制和规范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些限制和规范进而影响翻译过程,要求翻译过程中采用委婉语来温和地表达一些不便直接表达的事物和概念^{[1]23}。委婉语是礼貌的方式和文化的反映,以与文化翻译密切

收稿日期:2012-09-06

基金项目: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SK2010027)

作者简介:杨芳(1980-),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及文化。

相关的面子理论为基础,对翻译过程中委婉语表达的研究表明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要求译者使用恰当的委婉语。

二、文化视角下的面子理论

面子理论是用于诠释礼貌现象的人际关系理论。中西方学者长期以来都对面子理论在交际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和行为中的面子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有效的跨文化交流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面子具有的不同文化特征。

1. 面子理论与礼貌原则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面子”概念。戈夫曼将面子定义为:个人有效坚持的他人认为其在特定交往活动中所遵守的积极社会价值观,一种以得到认可的社会属性描绘出的自我形象^[2]。戈夫曼面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尽力维护面子,避免丢面子。然而,面子是一种很容易遭到他人破坏的要素。因此,人们相互交流时,所有的交流者除了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也要维护他人的。个人为了不让自己丢面子,在交际中常常使用礼貌性的语言维护他人的面子。布朗和莱文森对面子进行了系统研究,狭义化了戈夫曼的面子概念,认为面子是情感的投入,可能丢掉、维护或提升,需要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持续关注。他们认为面子有“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之分。积极面子指在某些方面得到肯定和认同的愿望,即在社会中被肯定和喜欢的需要,意味着个人需要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有着共同的目标。比如,赞美和表示尊重就是积极面子的体现,因为人们希望被人喜欢并感到自己的重要。消极面子指个体有自己的权利,是行动不会受到阻碍的愿望,是不被干涉不受强迫,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动的愿望。请求听话者原谅,威胁了听话者行为自由的道歉是消极面子的体现^[3]。

在分析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基础上,布朗和莱文森进一步分析了面子理论和礼貌的关系。礼貌原则由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提出,其含义是交

际者在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调节其会话内容,在会话交际中把不礼貌的信念降到最低,维护交际双方的和谐关系^[4]。布朗和莱文森认为面子是礼貌原则的一个部分,在研究语言礼貌时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概念就是面子,礼貌是意识到对方面子的表现。他们在扩展戈夫曼面子理论的基础上区分了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积极礼貌是说话人通过与听话人的共同点来维护他人的积极面子,意在维护个人作为社会认可喜爱成员的自我形象。关注听话人的需要和兴趣,对听话人的兴趣表示赞同,寻求一致避免不同意见,都是积极礼貌的例子。人们在使用积极礼貌时通常采用强调团结听话人的策略,如使用交际双方共同的方言及俚语表达,或使用昵称。消极礼貌是说话人尊重听话人的消极面子需要,避免干预对方的行动自由来满足对方的消极面子。消极礼貌常常采用强调说话者对听话者谦恭的言语策略:避免使用昵称,俚语及非正式发音;更多使用间接客观的提问方式;采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二人称称呼听话人;更多使用温和的方式减少对听话人情绪的影响^{[1][24]}。布朗和莱文森提出了五种礼貌策略:直言策略;婉言策略;积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回避威胁面子的行为。可以看出,交际者所有维护自身和他人积极或消极面子的行为都是礼貌,在这个意义上,布朗和莱文森提出礼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维护说话人和听话人面子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2. 中西面子理论差异分析

布朗和莱文森认为礼貌的基本社会功能是控制交际者之间的潜在冲突,声称他们的礼貌原则是所有语言的共同特征。事实上,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和礼貌原则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中,面子和礼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现代汉语词典》把礼貌定义为人们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的谦虚和尊敬^[5]。和西方的面子理论在认识上一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予他人以礼貌和尊重,重视交际对象的面子,强调在社会交际中礼貌和面子是密切相关的。然而,虽然对面子的关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都存在,但是对面子要求的标准却因文化不同

而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汉语的面子强调个体与社会间的和谐相处,而西方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强调个体的形象和愿望,个体是社会交际的中心^[6]。可见,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强调的侧重于个体的面子,而汉语的面子具有更多的社会倾向,不具有消极面子的含义。以礼貌原则为基础进行的话语礼貌评估受到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反映着文化差异。在特定的语境下采用何种礼貌策略因不同文化而有所差异。然而,根据面子理论和礼貌原则,交际者在和自己不熟悉的对象的交流中都应该表现出礼貌,让对方感到自己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被认同。礼貌原则提供了一个标准,以社会中礼貌的表现方式区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三、文化翻译与委婉语

1. 委婉语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交际中人们希望采用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使交际双方能顺利实现交流,委婉语就是实现这一愿望的一种表达方式。依据面子理论,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必须维护彼此的面子。由于在某些情况下直接表达一些观念和事实并不合适,说话人总想避免造成尴尬的场面或是避免让听话人感到不自在,那么可以采用礼貌策略来维护听话人的面子,通过使用委婉语中的一些模糊概念把面子威胁行为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有时说话人关注自己的面子可能更甚于听话人的面子,委婉语有助于把对双方面子的威胁都减到最低。交际参与者既要维护对方的面子,也要维护自身的面子。维护面子不仅具有维护对方的单向性,同时也是双向的,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甚至是以自我维护为中心导向的。委婉语是一种间接和模糊的表达,表达不能归结为一个清楚明确的交流目的的行为过程,为听话人留有余地进而体会理解间接表达的含义。直接性的表达往往被认为不如间接性的表达礼貌,因为直接性表达可能会损害说话人的积极面子和听话人的消极面子,而委婉语作为一种间接性语言,其使用有助于减少损害面子的行为。布朗和莱文森的

礼貌原则考虑的是把适合社会秩序复杂性的语言选择公式化,委婉语就是一种语言选择方式,通过使用谨慎选择的恰当模糊而含义积极的表达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面子^{[1]24}。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对委婉语的定义是用一种不明说的,能使人感到愉快的含糊说法,代替具有令人不悦的或含义不够尊重的表达方式^[7]。一般而言,委婉语指用听上去令人愉悦的方式表达冒犯性或微妙的概念或事物,是一种模糊和不明确的掩盖真实状况的表达方式。委婉语包含的话题一般有宗教、政治、死亡、人体器官功能和疾病等。委婉语是一种语言形式和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委婉语是一种修辞方式,渗透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生活与言语交际中,是说话者出于忌讳或礼貌,用含蓄暗示的雅言来表达可能会受到听话者怀疑,拒绝甚至厌恶的直率说法的表达方式^[8]。不同文化中都有一些语言和话题不适合于直接表达,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语言,所有文化都要使用委婉语,为避免这些语言或话题的消极意义及内涵,需要使用委婉语这样温和的表达方式。

2. 文化翻译的内涵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翻译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跨文化交际需要文化翻译。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在目的文中再现源文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时必然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9]。文化翻译的概念由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里奇在《我们自己与他者》一文中首先提出。王佐良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提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较早提出需要研究文化与翻译的关系^{[10]109}。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家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由此逐渐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学派。一般认为,文化翻译是指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及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11]。

文化翻译研究在近年来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中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依其形式可分为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底层的心理文化三类。其中,物质文化指人们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是文化要素的物质表现方面;制度文化指各种制度及制度的支持理论,如社会制度,礼仪制度,教育制度和语言制度;心理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思想行为,思维模式,信仰及价值观,审美品位等。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文化^[12]。制度文化的差异会带来语言的差异。翻译者以语言为工作媒介,文化差异导致了翻译中的尴尬和问题。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交际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误解就难以避免,翻译者有责任实现有效而准确的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翻译中,译者不应只在语言层面传递原文文本,还应该关注文化因素及原文文本所传达信息的自然准确翻译,发挥自身在译语中相当于创作者的重要作用,在翻译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识。文化翻译认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10][11]}。事实上,词语只是声音的随机组合,直到某一群体赋予一个词语某种特定的内涵,规定了它在特定的言语情景中的使用。这就是特定文化赋予这些表达的象征性价值观,文化决定了这些词语含义的褒贬等情感色彩,语言的内涵因文化而不同。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都产生了一些具有文化色彩的词语。文化翻译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转移而非文本这一客体的转移,文化翻译更多的在于翻译过程而非最终的翻译产品。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多维度多层次语境构成的文化框架下的翻译研究,促进了翻译跨学科的发展,实现了翻译与象

征性隐喻性的文化领域的现实对接^{[1]26}。

3. 文化翻译中的委婉语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作为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委婉语包含着文化特征,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使用该种语言民族的特定文化。委婉语的使用是与具体文化相关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的话语中都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委婉语,文化差异带来了不同语言委婉语表达方式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它们反映了文化的不同程度和文化的多种模式。不同的历史传统、社会规约、价值观、宗教信仰和道德标准造成了不同文化委婉语的使用不尽相同。在翻译中,文本背后原语和译语的不同文化决定了委婉语在原文和译文中使用的变化。常用的文化翻译策略包括归化、异化、补偿等。就文化翻译中的委婉语表达方式而言,译者可以采用三种翻译策略处理对令人反感问题的直接性论述:弱化原文的语言程度;使用委婉语间接表达原文概念;省略不译。译者的任务是必须确定何时何地使用以上何种策略最佳。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译者对原语及译语文化的熟悉程度起着决定作用。

四、结 语

不断增长的跨文化交际需要要求交际活动参与者不断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交际活动中礼貌而有效的交流。礼貌是受文化制约,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现象,一种文化中的特定礼貌行为或话语在另一文化中很可能是不礼貌的。根据面子理论和文化中突出要素礼貌的要求,说话人需要在交际过程中寻求办法减少对自己和听话人的面子威胁行为,确保交流的成功实现。如果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不采用对某一特定文化而言恰当的礼貌方式,就会导致交际活动的失败^{[1]27}。为了交际的成功和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人们都倾向于采用各种不带有冒犯性的委婉语作为修辞手段。文化翻译表明礼貌和委婉的理解及使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交际活动中的译者必须首先充分意识到文化差

异,同时具有对原语和译语文化差异进行调和的能力,并以此确定在翻译过程中对可能导致交际失败的冒犯性话语隐晦或公开表达的程度,采用恰当的委婉语进行翻译,最终达到当这些概念借

助于委婉语隐晦地表达时,听话者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和交际情境体会出隐含意图的效果,使交际活动得以顺利完成。

参 考 文 献

- [1]POUR B.S. A Study of Euphem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J]. Translation Journal, 2010(4).
- [2]何兆熊. 语用学文献选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53.
- [3]BROWN P, LEVINSON S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02.
- [4]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Longman, 1988:72.
-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87.
- [6]MAO L.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Face Revised and Renewed”[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4(5):23.
- [7]哈特曼,斯托克.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69.
- [8]冯庆华. 文体翻译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47.
- [9]蔡平. 文化翻译的困惑[J]. 外语教学, 2005(6):75-78.
- [10]师琳. 从认知语言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 外语教学, 2011(6).
- [11]刘禾. 跨语际实践[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1-4.
- [12]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8-9.

(上接第 59 页)和寻求女性主体性一直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两个基本命题。反抗男权文化的霸权压迫是寻求女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而寻求女性主体性则是女性恢复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的深层次的要求。女性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实现“自我”,就必须确认、塑造女性的主体性和健全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奠基于女性主体性之上的理论,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完整有效的女性主义理论。女作家徐坤曾指出:“在女性通

过写作而赢得自身独立、并促进人类精神生活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革的今天,拯救女性与‘疯狂’,帮助她们走出‘阁楼’的幽闭投向真正的解放自我,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男性和女性共同要面对的课题^[7]。”我们赞成她的观点,21 世纪,妇女解放和两性和谐仍然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没有妇女的完全解放和两性和谐,就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

参 考 文 献

- [1](法)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97-98.
- [2](英)简·里斯. 藻海无边[M]. 陈良延,刘文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95.
- [3]李小江. 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J]. 上海文论,1990(1):15.
- [4](英)玛丽·伊格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89.
- [5](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致死的疾病[M]. 张祥龙,王建军,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25.
- [6]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21.
- [7]徐坤. 文学中的“疯狂”女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